

生育友好型社会视域下厌男的话语、传播、动因及应对

程 萍

(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南京 211170)

[摘要]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背景下,全社会能否形成有利于生育的性别文化和舆论氛围,具有基础性、前提性的重要意义。然而近年来,以厌女、厌男为代表的网络性别对立日趋严重,对年轻人尤其是人生社会阅历较浅的在校大学生造成诸多负面影响。本文以厌男为研究对象,采取虚拟民族志研究方法,发现:厌男存在标签化表达、讽刺与戏谑、对抗性叙事的话语表现,圈层化传播、争议性内容流量化增强了厌男的传播效应;厌男兴起背后有着结构性矛盾的存在、媒介力量的参与、性别文化的混沌等诸多社会文化动因。对此,本文主张,应正视现代女性崛起与传统男权文化的天然对抗,通过加强权益保护、规范舆论环境、普及两性教育等应对之策,重塑现代性别文化、推动两性和谐相处。

[关键词]生育友好型社会;厌男;性别对立;社会文化动因

[作者简介]程萍,女,江苏涟水人,副教授,法学博士,研究方向:文化社会学、政治社会学、教育社会学。

[基金项目]本文系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博士科研启动基金项目“数智化时代高职院校‘精准思政’改革探索”(项目编号:2024BSKY26);2024年度江苏省高校哲学社科专题项目“社会转型背景下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发生机制与应对策略研究”(项目编号:2024SJSZ0303)。

[DOI] <https://doi.org/10.62662/llyj0102005>

[中图分类号] C913.68

[本刊网址] www.oacj.net

[投稿邮箱] llyj2025@163.com

一、研究缘起

为有效缓解“两低一高”(结婚率低、生育率低、离婚率高)的现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社会的加速到来,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权威调查显示,77.5%的受访者认为应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一体考虑,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不能只关注“生育”,而应覆盖生命周期的全过程,全社会能否形成有利于生育的性别文化和舆论氛围,具有基础性、前提性的重要意义。

然而,近年来,由于男女性别的身心差异而导致的社会文化差异被推到聚光灯下,围绕性别关系、权利与义务、婚姻、生育、话语权等话题的对立和割裂变得格外敏感。在平台资本、智能算法、公知大V、国外势力等的推波助澜下,性别对立加剧群体极化,俨然成为“流量密码”。网络上一旦出现热点事件,几乎就会有关于性别的讨论内容,相当一部分骂战因此而起,许多网友分为男女对立阵营互相攻击,为对方起各种侮辱性的蔑称。本文用厌女—厌男作为一对理想类型或性别关系光谱的两端,指代这种“性别对立”状态。

继日本社会学家上野千鹤子的厌女研究在中国知识青年中引发集体反思后,厌男这一概念从

2023年逐渐受到关注,韩国作家闵智炯(Ji-hyung Min)的《她厌男,她是我女友》、法国作家波利娜·阿尔芒热(Pauline Harmange)的《我,厌男》得到追捧,关于厌男的网络话题不断涌现,以小红书女性用户为代表的年轻网友甚至使用“避男标签”(如#宝宝辅食#、#男性结扎#、#男性备孕#等)进行算法抵抗,避开男性凝视与网络骚扰。

无论厌女还是厌男,对年轻人尤其是人生社会阅历较浅的在校大学生来说,存在诸多负面影响:容易妖魔化对方,影响两性和谐关系(比如,“男人都是下半身动物”“女人就是情绪化”等言论);缺乏理性平和心态,掉入二元对立思维陷阱(比如,“婚姻是爱情的坟墓”“不婚不育保平安”等言论);被不良思潮裹挟,价值观念畸变(比如,“没钱就没爱”“有钱就有无数爱”等言论),等等。这些负面影响也得到了思政教师、辅导员等一线教育工作者的研究和证实。任其泛滥,必将加剧两性关系撕裂,降低双方结婚生育意愿,进而梗阻生育友好型社会的构建。

鉴于以上,本文采取虚拟民族志的研究方法,以中国领先的年轻人文化社区和视频平台B站作为主要、其他社交媒体作为辅助田野调查点,呈现网络厌男的话语表现和传播机制,探索其社会文化动因,并尝试从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的角度提出应对之策。

二、概念界定

厌男又称男性贬抑(misandry),源自古希腊文“厌恶”(miso)和“男人”(aner)的结合,跟恐男症(male phobia)不同,厌男并非严格医学术语,主要是指对男性的强烈反感或厌恶情绪,这种情绪可能源于个人经历、社会文化影响或心理因素,通常是指女性针对男性的贬抑厌恶。少数男性也可能有贬抑男性的观念,如贾宝玉把男子统称为“须眉浊物”,自称“见了女儿,我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

厌男最早出现于1871年的《旁观者》(The Spectator)杂志,1952年的韦氏词典收录了此词。作为一个外来词,它与西方女性主义运动息息相关。法国女性主义作家克洛伊·德洛姆(Chloe)一针见血地指出厌男的本质。在她看来,“厌女者厌恶的,是女性本身,其对女性的看法是完全生物性的……而厌男则是一种回应,并非针对绝对的男性性别,厌男者真正鄙视的,是男人们野蛮地躺在特权环境中坐享其成。从根本上来说,厌男是在反对男权,并不是厌恶男人,而是厌恶塑造男人的社会和文化系统”。

三、话语表现

本文通过对微博、抖音等社交媒体中厌男话题的分析,发现其话语表现主要有这样一些特点。其一,标签化表达。用来描述男性的标签在不同场景生成,并在网络传播中迅速完成“去情境化”,成为厌男热梗,类似“直男癌”“妈宝男”“油腻男”“普信男”“爹味”“吊子”“蝻”“蝻人”等。“蝻”“蝻人”一词则起源于豆瓣小组,是国男、男人的谐音,用虫字旁是想指征中国男人是跟蟑螂一样让人恶心的生物,很多缺点让女孩子不能接受。缺乏边界感的好为人师的“爹味”说教,让年轻人尤其是女孩子反感,比如,某教授的提问曾经引爆网络:“现在(中国)女同志不愿意结婚,不要小孩,家长也好,领导也好,你动员她,劝她,她不听”,“她们怎么能够这么相信你们(哈萨克斯坦政府)的话,老老实实的,服服帖帖地就这么生孩子,早生、多生”。

其二,讽刺与戏谑。以鬼畜视频、表情包解构“普信男”“油腻男”“妈宝男”形象,仅“普信男”在B站中就有近千个解读和模仿视频。为什么PUA“女孩要懂事、要乖”却鼓吹“男人至死是少年”,这种性别双标引起厌男者反感,评论区列举了男人幼稚晚熟、没有责任心、始乱终弃、永远喜欢18岁少女等数桩“罪行”,嘲讽“男人至死是巨婴”。有网友如此调侃:“中国男孩保护中国女孩的例子包括但不限于‘家暴可是家事’‘你在烧烤摊挨打也是你穿得少’‘谁让你晚上出去吃烧烤’‘吃得起车厘子谁知

道是干什么工作的’‘染粉头发就是鸡’‘女人怎么考得上硕士’‘最好不要彩礼但带一套房一辆车当嫁妆’‘月经为什么不断住’‘我们不同意高铁上卖卫生巾’。”

其三,对抗性叙事。很多女性会在网上分享个人经历,控诉在社会、家庭、职场所遭受的性别歧视(如晋升天花板、生育惩罚、荡妇羞辱、家暴、性侵)等,微博#姐姐来了#话题阅读量超28亿次。B站视频“为何男性没感受到性别红利?女性却感受到不公!一次坦诚的男女对谈!”播放量222.4万,评论18846条(截至2025年2月8日),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对“伏弟魔”满满的抵触,比如:“怎么拒绝?父母在后面要,你不给立马翻脸,说的好像女性就必须无私奉献自己一样,你是不知道有些家长的话有多难听。她怎么拒绝?背上不仁不义断亲的后果才能拒绝,不然家人永远像附骨之疽一样缠着你,想摆脱都摆脱不了,最后还不是妥协。更甚者,家长从小教育要把好的留给弟弟,潜移默化地让她认为对弟弟好可以不顾一切,可以放弃自我的需求。”

四、传播特征

厌男主题的网络传播因平台有一定的差异性。微博话题是标签式扩散,易形成群体极化;豆瓣小组主要采取封闭讨论,一定程度上会催生加密话语体系,不断加强情绪的渲染;短视频平台主要是通过情景剧解构男性权威形象。厌男在B站的传播兼具以上,同时也有自身规律:

其一,圈层化传播,女性向UP主与粉丝群体的互动,高度强化话语认同。两性观察评论类UP主纹翼大叔奉行“婚姻自由,恋爱自由”,拥有粉丝33.9万,虽然是男性,但主张性别和解,认为男女都应摆脱传统思维、突破刻板印象,向雌雄同体的现代性别观转型。其视频“有些男的为啥这么厌男?”评论区里,以女性为主的用户列举了对男性“讲脏话”“抽烟”“不做家务”“不带娃”等恶习的嫌弃,“我的天,我爹就是出口成脏,老是骂家里人,还不许别人还口,当他意识到是自己错了的时候,也不会道歉或者反省什么的,就当没事发生,而且下次还干。我妈说因为他是男人,我天呢!”“我服了我们学校有人在楼梯口女厕所门口抽烟,每天有人上下楼梯进出厕所都要被呛到,有人说了他们,他们就说抽烟就跟吃饭一样,有本事你们别吃饭。”

二是争议性内容流量化,男女对立话题的播放量显著高于中性内容。从内容分析来看,围绕厌男的用户态度实际上包括支持者、反对者、中立者三种类型,支持者强调厌男是对性别压迫的反抗,反对者批评厌男是“性别歧视”或“极端女权”,中立者呼吁两性理性对话但中立的声音很容易被淹没。

大学生在参与心理的引导下加入“性别对立”讨论,已经成为相关网络舆情的主要参与者和重要传播者。有研究者在针对大学生是否刷到过“性别对立”网络事件等问题进行问卷调查时,只有不到14%的大学生完全没关注过这类事件,其他超过86%的大学生均有一定了解或者有所耳闻,而且近1/3的大学生在看到性别对立热点话题时的处理方法是网络中进行点赞、评论或直接转发。

五、动因分析

如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所提出的,性别并不是一种生物上的固定属性,而是一种社会建构,是在特定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环境中形成的。本文强调并主张探索厌男兴起背后的社会文化动因。

(一)结构性矛盾的存在

线上厌男是性别矛盾在网络空间的投射,厌男某种程度上是女性面临的经济压力(如就业、养家)与婚恋焦虑(如高彩礼、房价问题)等的情绪转移。一方面,传统“男主外,女主内”分工模式被科技革命带来的冲击打破。据调查,中国适龄女性工作率超过70%,长期位居世界女性工作率第一名,但据统计,女性收入仅为男性73%,在做家务、陪伴子女等方面的平均时间均远超男性。2023年经济学诺贝尔奖获得者、哈佛大学教授克劳迪娅·戈尔丁(Claudia Goldin)基于对美国五代女性争取平等的百年历史的实证研究提出,家庭和事业是无法兼顾的。在她看来,当前,在“贪婪的工作”结构下,男人成家且晋升,是因为女人放弃了事业,为家付出了更多的时间。另一方面,在性别比例失衡(2024年中国总性别比104.34,以女性为100)的情况下,对女性的法律、政策、文化、经济等保护并不足够。韩国社会学家张庆燮基于压缩现代性理论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家庭作为压缩现代性的一种功能性容器发挥作用,因此它既带来了极大的回馈和满足感,也承担着巨大的压力、负担和风险。从这个角度看,中国人的家庭主义既是(压缩)现代性的,也是传统的。特别是随着家庭主义的负担和风险被放大,越来越多的中国女性通过选择不婚不育、单身生育、弃夫留子,务实地避险,或减轻来自家庭的责任和义务。

(二)媒介力量的参与

其一,智能算法推荐容易导致“信息茧房”,搅动性别对立论战。以数据—流量为基础的数字生态是平台资本主义牟取高额利润的奥秘所在,也是获得垄断权力的根源所在。基于对高额利润的内在追求,智能算法推荐的价值中立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一个伪命题。它容易加剧用户接触信息的同质化,让人们只看到想看到的、只听到自己认

同的观点,最终变成一个只能听到自己声音的“密室”“茧房”,公共信息的传播、社会意见的整合、社会共识的形成会变得日益困难。青年学生作为互联网参与度高且敏感活跃的群体,在性别圈层相对封闭的环境中生活,再加上心智发展尚未完全成熟,也更容易卷入性别对立的论战中。其二,“她经济”浪潮下商业营销对女性主义、女性力量等性别话题的推崇。中国拥有近4亿年龄在20岁至60岁的女性,每年支配着近10万亿人民币的消费支出,庞大的体量足以构成世界第三大消费市场。针对“女性力量”的营销成为新趋势,“她题材”影视作品方兴未艾,《消失的她》《出走的决心》《好东西》等电影作品纷纷均破圈,在社交媒体平台中掀起对“她力量”的讨论热潮。

(三)性别文化的混沌

在社会转型期,性别文化处于传统主义与现代主义、家庭主义与个体主义、男权思想与女性主义相互角力的混沌期。“女性主义是一场终结性别歧视、性别剥削和压迫的运动。……没有男性盟友加入这场斗争,女性主义运动就不会有进步。”客观地说,男女都是传统男权文化及其规制的男性气质的受害者,对女性的伤害是显性的,对男性的伤害更隐蔽。英国艺术家格雷森·佩里在他的书《男人的起源》中提出一个问题——人们为了重塑男子气概,付出了怎样的代价?他认为,由于几万年形成的男性社会模式,导致了现代男性的挣扎和无措。美国社会学家康奈尔提出的男性气质理论,重新定义男性气质为人们在性别关系结构中所谓“男性化”的位置上所进行的社会实践构型,突破了男女二元对立关系研究,提倡开放、宽容、动态地看待两性性别身份和性别关系。

六、应对之策

厌男的兴起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其通过网络提高性别议题可见性,推动反思男权文化对两性关系、社会和谐的危害。本文提出,要从结构性意义上理解两性困境,从社会责任取向的催婚催育转向人本主义取向的软环境引导。

一是夯实女性权益保护。“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打得过小三,斗得过流氓”,这样的话语看似褒扬,实则是对摇摆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中国妇女的道德绑架和捧杀,更似是对女性权益保护不到位的辩解。近年来,国家从法律和政策层面不断加强对女性权益的保障,婚姻家庭辅导教育工作也得到重视。但对较为隐性的来自用人单位的生育惩罚、性别歧视、性骚扰等,还需要人社部门、妇女团体、劳动仲裁机构、法律援助机构、社会工作机构等加强监管、问责和辅导力度,否则很可能出现网络

me too 运动(这也是许多女性无奈选择的“弱者的武器”)此起彼伏,冲击社会稳定、两性和谐。

二要严格规范舆论环境。在关于性别相关事件的报道中,秉持客观公正原则,避免片面渲染;在“清朗·网络戾气整治”等专项行动中,加大对故意制造性别对立媒体的打击力度;督促网络平台加强内容审核,过滤极端性别歧视言论,对违规账号严肃处理;对公益广告、文化活动、影视作品等载体中物化、矮化、污名化两性的行为坚持零容忍,鼓励宣传支持女性发展、具有现代性别平等观的男性(比如中国首位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共和国勋章获得者、药学家屠呦呦的丈夫李廷钊);支持出台高质量婚恋综艺,引导公众加强两性认知。

三要深入普及两性教育。近年来,出现了各类心灵成长类的线上线下研修班,但其主题基本以希望解决职场关系、家庭教育、夫妻感情的女性为主,男性身影较为罕见。所以,普及两性教育的责任亟待行政力量自上而下的推动。初中级教育阶段应将性别平等教育融入相关课程体系,从基础教育阶段培养学生正确性别观念,消除性别刻板印象,呼唤两性觉醒。高校思政教育可以更加灵活多样,改善恋爱选修课“一座难求”的现状,鼓励学院派教师(如复旦大学梁永安教授、沈奕斐教授,南京大学朱虹教授等)积极占领舆论阵地,通过网络主播、社区服务、心理辅导、社会兼职等多种形式,用专业学识引导年轻人建立科学健康的爱情观、婚恋观。北京林业大学方刚教授甚至创办了“白丝带男性反对性

别暴力热线”,是目前已知的唯一在中国持续地从事推动男性参与性别平等的团队。

参考文献:

- [1] 单宇. 公众对生育友好型社会的认知与期待调查报告[J]. 国家治理, 2024(4): 50-55.
- [2] 周栋. “性别对立”对辅导员工作的挑战及应对[J]. 高校辅导员, 2023(5): 77-80.
- [3] 赵爽. 性别对立的网络争吵, 还要持续多久? [N]. 人民政协报, 2021-9-27(5).
- [4] 王琴, 丛颖. “避男标签”: 小红书女性用户的算法抵抗研究[J]. 中华女子学院学报, 2024, 36(3): 71-79.
- [5] 秦步焕, 王祥凯. “性别对立”网络舆情对当代大学生的影响及应对策略[J]. 廊坊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40(2): 95-102.
- [6] 波利娜·阿尔芒热. 我, 厌男[M]. 一千度, 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23.
- [7] 蓝江. 数据—流量、平台与数字生态——当代平台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J]. 国外理论动态, 2022(1): 107-116.
- [8] 张林. 智能算法推荐的意识形态风险及其治理[J]. 探索, 2021(1): 176-188.
- [9] 喻国明. 算法推荐与“信息茧房”的破解之道——试论算法技术的迭代逻辑、内核扩容与结构保障[J]. 媒体融合新观察, 2021(6): 4-6.
- [10] 澎湃新闻. 10 万亿“她消费”的浪潮来袭: 洞见“她经济”的“钱景”[EB/OL]. (2024-3-8) [2025-2-10].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6588107.
- [11] 塔比·杰克逊·吉, 弗雷亚·罗斯. 女性主义有什么用? [M]. 吴庆宏, 译. 上海: 译林出版社, 2021.

The Rise of Misand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ldbirth-friendly Society: Discourse, Communication, Motivation and Response

CHENG Ping

(School of Marxism, Jiangsu Maritime Institute, Nanjing Jiangsu 211170,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actively respond to the acceleration of the aging society,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20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roposed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a childbirth-friendly society. However, in recent years, the online gender antagonism, represented by misogyny and misandry,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serious, causing many negative impacts on young people, especially college students with little life and social experience. In this context, this paper takes misandry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uses social media such as Bilibili as the fieldwork point to conduct a virtual ethnographic study.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are discursive manifestations of misandry in labeled expression, irony, banter, and confrontational narratives, and the communication effect of misandry is enhanced by circle communication and controversial content traffic. Behind the rise of misandry, there are many social and cultural motives, such as the existence of structural contradictions, the participation of media forces, and the chaos of gender culture. In view of the above finding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we should face up to the natural confrontation between the rise of modern women and the traditional patriarchal culture, and reshape the modern gender culture and promote the harmonious coexistence of the sexes by strengthening top-level guidance, standardizing the public opinion environment, and popularizing gender education.

Key words: childbirth-friendly society; misandry; gender antagonism; socio-cultural dynamics